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大／师／精／粹／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沃勒斯坦精粹

原著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翻译 黄光耀 洪 霞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F112.7
9

/ 大 / 师 / 精 / 粹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沃勒斯坦精粹

原著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翻译 黄光耀 洪 霞

南京
大学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沃勒斯坦精粹/(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黄光耀,洪霞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4144-0

I. 沃... II. ①沃...②黄...③洪... III.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集 IV. F11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719 号

The Essential Wallerstein

© 2000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登记号 图字:10-2002-099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沃勒斯坦精粹
原 著 者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译 者 黄光耀 洪 霞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125 字数 450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144-0/C·126
定 价 33.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编委会

主 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天石 许 钧 张一兵

张凤阳 周 宪 周晓虹

倪梁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

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窠域外学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

前 言

我曾将我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题献给托伦斯·K. 霍普金斯(Terence K. Hopkins),以感谢他对我著述的长期影响。1974年时,我对已逝的20年一直铭记在心,然而自那以后我们又有20年的友谊和合作。尽管他已离开了我们,但我宁愿说他没有走,他留下的遗产将令深深了解他的人们永远怀念。

将我30多年的写作汇集成册,我需要公开表达许多其他的致谢。从教育方面来说,我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它的一般通材教育计划的产物,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产物,该系可能是1950年代世界社会学界唯一最有影响的并且专注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阐释的系科。我的将许多领域的知识加以综合的努力确实源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通材教育传统。我与社会学研究生项目的关系就更加广泛。就社会科学模式而言,我基本上并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逆者。在与当时正统观点和总是在学术上严

肃努力的人的争论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并且毫无疑问我开始了学术训练的起点。

在哥伦比亚,有许多教授(他们有的后来成为我的同事)在学术上令我激动因此对我影响很大:马克·范·道伦(Mark Van Doren)既充满智慧又令人不悦的粗俗;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专注于阐明道德选择和学术争论之间的联系;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热衷于学术炫耀和追逐潮流;罗伯特·S. 林德(Robert S. Lynd)信守毕生的政治承诺;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总是促使我去寻找强有力的证据以捍卫我与他的政治不同点。

还有许多处在同一年龄段的同事,我同他们共同进行学术探讨,同他们(还有霍普金斯)争论、辩论和讨论了30多年。有三位同我一起组成了“四人帮”——塞米尔·阿明(Samir Amin)、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冈德尔·弗朗克(Gunder Frank)。我们一同写了两本书并且一同参加了无数次非正式聚会。我总是说我赞同他们各自观点的80%。近年来,我赞同冈德尔·弗朗克的比例已经下降。但是他们都与我保持着学术上和个人的友谊。是否要列出所有我同他们合作过的其他人的名单我感到为难。但是我至少应列出下列我与他们进行过亲密合作的人:在德国的奥托·克莱叶(Otto Kreye)、在法国的埃提纳·巴里贝(Etienne Balibar)、在墨西哥的帕比罗·冈萨雷斯·卡萨诺娃(Pablo González Casanova)和在埃及/法国的安诺尔·阿卜杜勒-马莱克(Anouar Abdel-Malek)。

就在哥伦比亚、麦基尔(McGill)和宾厄姆顿(Binghamton)的我的学生而言,他们是鞭策我的无尽动力源泉,使我作为一名教授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但是名单太长,我只能感谢他们(已不再是学生)中的四位,是他们向我包括这本书提出

认真严肃的建议。他们是沃利·高德弗朗克(Wally Goldfrank)、比尔·马丁(Bill Martin)、理查德·李(Richard Lee)和乔治·德鲁吉安(Georgi Derluguian)。

最后我要特别对贝特里斯(Beatrice)表达谢意,在许多关键时刻贝特里斯都和我站在一起并给我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这些建议我总是很少采纳。我承诺将改进。

导 言

我的学术生涯就是苦苦寻求我和其他人可能对其产生作用的当代现实的恰当的解释。对我自己或对任何人来说,这种寻求既是学术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我总感觉这种寻求的学术性和政治性是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一存在。 XV

我猜想当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纽约上中学时就开始了上述寻求。我的家庭充满政治意识并且世界事务常常在我们家成为讨论的话题。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是我们首先关注的。我们也强烈意识到,那个时代全球左派在第二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巨大分裂的存在。即使在战时一致和相对缓和的氛围下,界分两个国际的观点仍然相当突出。对我来说,它们在美国本地的反映就是在纽约自由党和美国劳工党之间的政治分野。当我在1974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我年轻时代校园的最活跃的政治组织是美国老兵委员会(AVC)。尽管我太年轻没有成为一名老兵,但是我参加了老兵委员会

的公共集会，并且目睹它被同样的分裂造成的解体（和毁灭）。

我本人对这些争论的反应比较复杂。我相信社会民主党对共产主义的所有的批评都是正确的：斯大林主义的邪恶和恐怖、无原则地改变党的路线、毫无生气（Langue de bois）。然而与此同时，我相信共产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一切评价——逐渐堕落到西方民族主义、令人难以置信地削弱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反对以及对种族歧视缺乏严肃战斗性。

xvi

从政治方面来说，这使我陷入了我曾一直进行抗争的困境。从学术上来说，它使我重又面临了一系列这些年来我在写作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我所称的反体系运动的本质是什么，他们的活动是如何被体系束缚而结构化，这种束缚使他们从来都不能充分地解脱出来。简而言之，为了理解他们如何去做他们已做的事情，同时更好地形成目前真正有用的政治观点，我开始将这些运动历史化。

1945—1950年早期后冷战时期是令人兴奋的日子，那时什么似乎都是可能的。对我（也对许多其他人）来说，这一时期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结束。突然反共产主义的影响四处蔓延，同时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兴盛。1951—1953年间，我在美国军队服役，当我回到哥伦比亚时，我决定以作为美国政治分化现象的麦卡锡主义为题撰写我的学位论文。我吸收了米尔斯（Wright Mills）在《劳动的新人》一书中阐述的老练世故的保守派和实用的右派之间的不同特点，论证麦卡锡主义是实用右派的组成部分，仅仅稍稍涉及共产主义者，事实上直接首先反对的是世故的保守派。这是一篇广为赞同的论文，在当时被广泛引用。我自我感觉应该把自己看成用1950年代的语言说是一位“政治社会学家”。

尽管如此，我不打算把美国政治学作为我学术研究的首

要领域。自我中学毕业以来,我对非欧洲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特别关注现代印度的一系列事件,并阅读了大量甘地和尼赫鲁的著作。1951年,我参加了一个国际青年会议,在那儿我结识许多来自非洲的代表,他们比我年长并已经在他们国家担任重要政治职务。1952年,另一次青年会议在塞内加尔的达喀(Dakar)举行。突然我发现我自己处于不久成为独立运动(比如法属西非)的动乱之中。

我决定把非洲作为我学术研究和持久努力的焦点。由于我会讲法语并有广泛的联系,我成为跃过欧洲语言障碍而研究非洲的少数学者之一。1955年,我获得“福特非洲合作基金”(Ford Foundation African Fellowship)到非洲进行研究和撰写关于黄金海岸(加纳)和象牙海岸志愿协会在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中的地位学位论文。当时我成为一名非洲学者,这种学术的角色一直持续了20年。我写了许多关于非洲主题和问题的著作和论文。1973年,我成为“非洲研究协会”(美国)的主席。大约20年时间内,我设法游历了全非洲,可能到过了独立国家中的四分之三。

如果说我的学术探求导致我早年远离我自己的祖国来到当时的非洲——我第一次访问并开始研究非洲时,非洲仍是个殖民地大陆——那是因为我对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在20世纪占有重要地位的为摆脱西方世界的控制而进行的斗争事件,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今天我们称这是与北南关系或核心—边缘关系或欧洲中心论相关的问题。

据说,20世纪50年代以及在那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我的那些最重要的评价不被广泛地接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些人所说的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冷战和另外一些人所称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所有这些名词都被相当狭义地加以界定)是(确实有许多表现存在)我们时代的中心讨论话

xvii

■
导
言

题。因此我的探索不仅反对政治学术领域中广泛接受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且反对源于这种主流的、我自己内心深处存在的观点的各种概念。非洲虽然不再是我研究工作的主要焦点,但是,我坚信我的非洲研究是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当代世界的激烈的政治问题以及看待如何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历史的学术问题的。正是非洲对我所受教育的比较愚蠢的部分提出了挑战。

起初我认为学术和政治上的争论仅仅包括对当代现实的实际分析,但是不久我开始意识到正是分析的方法本身值得怀疑。我被教会的各种方法对我来说似乎限制了我们的实际分析,并且曲解了我们的解释。渐渐地,大约有 20 多年时间,我的观点得到发展。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我开始声称我正在试图从长远的角度即我所称的“世界体系分析”,来考察世界。这涉及到两个主要的学术选择,第一个是最关键的即“分析的单位”的选择,唯一合理的分析单位是一个“世界体系”,或者用更一般的话说是一个“历史社会体系”。

第二个学术选择是抛弃所谓的强固和划分所有现代社会科学——即强固和划分描述性研究 (*idiographic*, 研究特殊规律的) 的人文学科和规范性的 (*nomothetic*, 研究普遍规律的) 科学的方法论之争——这完全是个错误的辩论。通过选择所有和各种各样的要求我去做的各方面,我开始相信——开始时凭直觉,后来则更加理性——如果所有的分析被认真地用以对真实世界进行描述和解释,那么这些分析必须同时是历史性的和体系性的。

xviii

有关我的学术工作的两个基本前提,即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分析的单位 and 坚持所有的社会科学必须同时是历史性的和体系性的,将在本书的有关论文中得到阐述。当我第一次提出它们时,没有一个前提受到欢迎或受到热烈欢迎。第一个

前提成为我的标签而且已产生了巨大影响。我比较详细地提出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的一个单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其次是在本书第五篇论文中重提。《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和本书第五篇论文均发表于1974年,受到较多的赞成。有的人完全接受,也有的只承认应认真对待我的论点。反驳最激烈的人常常并不是在实际领域(基于它事实上的纠正)反对它,而是在认识领域(因为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能伪造的主张)。

因此我发现单争论对真实世界的不同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论争是我们如何能知道哪种描述实际上是正确的,或比另外一种更正确,或更合理,或更有用。为了我和其他人所从事的将社会过程作为相互结合的、复杂的整体的分析研究得到承认,我必须同认识论上的观点进行论战,本书第二部分的论文阐述了我是如何逐渐将注意力转到认识论领域的论争和那些暗含有对社会现实的不同视野的方法。

我发现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实际的结果。我觉得上述两个前提能够使我们重新解释许多昔日的争论并能够收集到各种新的和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依我看确实能说明当代的现实。特别是这种经过修正的观察社会现实的方法不仅阐明了关于在建设现存的世界体系方面的历史选择,而且还阐明了我们在未来建设成功的世界体系(或各种体系)时将必须作出的选择。世界体系分析使我们能涉及广泛的具体问题,但这些具体问题最终可能都会结合在一起。不是世界体系分析能使我“发现真理”,而是世界体系分析能使我按照我认为更加有利于我们大家作出政治和道德决定的方式,对社会现实作出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世界体系分析还能够使我在恒久的结构和那些我们通常使其具体成各种流行理论的短暂表达之间加以区别。最近的热门话题所谓的“全球化”就是

后的一个例子。

我把我的精力投入于对现代世界体系(我坚持这是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功能和发展的解释。我力图解释它的制度性的矛盾、它的历史源起和我认为它已进入体系性危机、因而正由混沌向一个新秩序转换的时期的原因。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包括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制度结构的分析性阐述——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周期、商品链、家庭收入共享、国际体系和它的霸权周期以及地缘文化——此外还包括对作为一个解释模式(现代化理论)的民族发展和发展主义的详细的评论。

“世界体系”术语常常引起对平衡和一致的联想。在我的思想中这有最深入的解释。的确,关于体系的最有趣的事情是所有的体系是如何会有深深的分裂的,它们正在通过制度化而试图限制这种分裂。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和马克斯·格鲁克曼(Max Gluckman)很久以前都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在减少内部冲突或甚至在避免使用暴力形式方面各种体系从来都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这同样是事实。这种理解仍然是我们从卡尔·马克思著作中获得的主要遗产。

进一步说,当我们共同地对最近的几十年有一个十分清楚的了解的时候,在任何历史体系中都存在着不只一个的分裂。因此我开始花费精力试图分析哪一种分裂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是主要的分裂、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不同和相互关联的以及每一种分裂是如何限制了其他分裂的作用的。这些都是第四部分的主题,我试图从语义上分析我所认为的我们现代世界存在的五个主要分裂:人种、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

最后,我转向我们都很关心的问题:怎么办。我将第五部分称为“抵抗,希望和诱惑”。这些词语对我来说正好描述了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反体系运动的历史进程。我除了试图在大的地缘政治框架内讲述这些运动的经历,还要使用我们已经发展的政治概念去解释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向往。

我本来设想这本书仅为这四个部分。在我的几个朋友的坚持下,我将我早期的作品(1974年前即《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以前)增加为第一部分。这些作品主要是关于非洲和更小一点是关于现代大学的。因为我相信一个人如果没有认真研读一个作者所写的作品就不能理解或评论他或她(特别是反对一个作者时更是如此),所以我对朋友们的这种建议表示谢意。

XX

本书的第一部分因此展现了我是如何走向我后来称之为世界体系分析之路的。我对种族的可能的含义进行抗争。我尽力去体会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令人激动和具有影响的著作。我试图从1968年中得出关于“在自由社会中的激进知识分子”正确的政治态度的结论。我也试图使自己适应从早年的关注非洲转到后来的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体研究,再转到研究知识结构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在读、观察、分析和写作,因此我已经意识到我的学术经历中存在一些重复的和潜在的课题,对我来说有些最困难的问题需要阐明。其中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看重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创造并付出的普遍性的奋斗而反对我们所有人坚持的对特殊的价值的宣称权利。人们很容易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普遍性观点的表达而别人的观点则是各种特殊性观点的表达。假如以自我为中心的普世主义是苏亚拉(Scylla),查理波的斯(Charybdis)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殊性,那么宣称每一种社会观点、每一种学术观点和世界上的每一种领悟都是同样合理的、或有用的、或善意的,不应该有什么学术上和道德上的差别。这两种观点均否认了共同

分析、欣赏和接近一个最合理、最民主世界的可能性。

第二个顽固的问题是真实世界与我们对它的理解之间的关系。这几乎不是个新问题，最近几十年一直在集中讨论。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确实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是我们学术观察的目标。那么我为什么还费劲写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并且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会被视为精神病。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同样明确的是，我们似乎是用一副眼镜观察这个真实的世界，镜头的镜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一切，假如我们记住世界现实的构建确实是社会性的——即共同的而非个人构建的，那么世界的现实由社会构建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毫无疑问的。

xxi

很明显，同时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和我们只能通过一副眼镜观察它，就给那些严肃的学者带来一个困惑。它需要不断地对我们的观察是如何曲解的和我们怎样能够提高我们的理解能力作出反应。但是每一次对我们自己的反应本身都受制于同样的困境，正是这种困境促使我将认识论的问题作为我的分析的中心课题。

第三个一再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新问题）是学术分析对政治行动的关系——古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已经说过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冲突。恰恰相反！但是我再次认为这是个特别需要避免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科学的假代言人大肆宣扬客观性观点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是在政治忠诚领域学者对某些权威（国家的或政党的）的顺从。对我来说，推翻公认的真理由似乎是学者的责任，并且只有当它反映了一种尽我们所能投身于和理解真实世界的严肃企图时，这种推翻就能对社会有用。